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辩证法基础

尹健¹ 刘同舫²

(1.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2; 2.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处理文明性与现代性、文明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等关系中推动形成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自觉和实践自觉, 内蕴深厚的辩证法基础。在文明塑造的连贯性与阶段性相互统一的历史辩证法基础上,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逐步展开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主选择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在人民主体性与客观历史规律良性互动的认识辩证法基础上,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效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定式, 确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主体地位和现代化主体力量; 在“两个结合”与“两种作用”有机融合的实践辩证法基础上,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循序推动本土文明自信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辩证法基础在具体构建中成为不同文明有效对话和共同规范现代性的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辩证法; 文明主体; “两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 (2024) 04-0098-08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百余年探索创造的成果, 是对人类文明类型和一元现代化路径的反思与重构, 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体自觉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中华文明始终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除依靠中华民族稳定的空间发展模式和深厚的文化精神品格外, 还在于其有效解答了与当今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 如何认识文明、如何对待差异性文明以及如何构建文明共同体, 并在此过程中对现代化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予以历史性确认, 形成了本土文明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掌握文明整体演进规律并推进人类文明创新的典范。准确把握实现中华民族文明特殊性与世界文明普遍性相统一的方法, 深入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辩证法基础, 对恢复被全球现代性意识形态遮蔽的文明样态, 避免世界陷入新型文明冲突的危机以及辨析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本质等尤为重要。历史辩证法主要在文明演进中把握文明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 认识辩证法着重在主客体互动中洞悉文明

的本质特征, 实践辩证法侧重揭示人与文明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方式。从历史、认识和实践视角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辩证法基础, 不仅力证三种辩证法原则贯穿中华文明建设路径的始终, 而且展现了中华民族在贯彻上述原则过程中厘清文明性与现代性关系的独特智慧, 并在与西方思潮进行批判性对话中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意义。

一、文明塑造的连贯性与阶段性相互统一的历史辩证法

历史辩证法是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重要维度, 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基础。匈牙利哲学家乔治·卢卡奇 (Georg Lukacs) 曾探讨人类文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使命, 他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之处在于将“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社会化了的人的一切现象都彻底地变成了历史

收稿日期: 2024-01-27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的辩证法总体性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3CZX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尹健,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刘同舫,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问题”，并使之“具体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①，系统阐述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对于澄清人类文明进步历史倾向的基础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马克思在历史过程中克服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等二重性问题的思路。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视域中，被称为历史过程内部辩证法的黑格尔哲学不过是运用概念搭建历史的抽象神话，使人类文明沦为漂浮于概念体系之上的无根浮萍。马克思重视在人类社会生产的历史过程层面探索文明的生成与塑造，无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工人劳动创造的文明成果与自身劳动相异化的资本批判，还是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带来的社会大分工“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②的洞察，都说明其既肯定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到更高阶段的客观表征，又揭开了资本主义文明借助世界普遍交往和社会化生产与分工维持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并产生现代性文明危机的实质，强调只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没有消除，人类文明的创造和再创造就必然建立在更高阶的社会形态以及长期曲折发展的历史辩证运动基础之上。

第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连贯性发展的特征，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对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与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是一个长期过程的判断并无二致。马克思在批判庸俗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视为历史的规定性形式时指出，“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③。文明的塑造在质变过程中伴随资本文明在量上的收缩和共产主义文明在量上的扩展。“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来说，一方面是现代化，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现代化。只有在这个两方面的历史性统一中，才谈得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融贯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任务持续结合和深度展开的过程中，与此同时，在一定时期内呈现的稳定形式既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不懈动力，又充当其丰硕成果而深

厚地积淀下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实现共产主义文明的阶段性成果，具有稳定的空间规模和厚重的文化积累，在人类文明史演进中内蕴一种本质不变但内容常新的文化基因，逐渐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必然关联，衍生出社会主义文化品格和历史意识作为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连贯性的内生动力，推动资本主义文明这一质态在量上的缩减。

第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阶段性推进的特征，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对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性和具体性理解基本一致。马克思认为，人类从事的现代文明活动总是在具体的条件下展开，历史的辩证特性构成人类生命活动的内在规定性，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文明的理解与追求迥然不同。现代文明正是在不同民族的生存论差异阶段中生成、在具体的社会发展阶段中推展。法国哲学家巴利巴尔指出：“文明的遥远开端和‘现实’现象能够联系起来，这一点尤其令马克思感兴趣。”^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依据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著作家对“进步”的考察，认为“他们已推测出（见欧文及其他人的著作）文明世界的基本缺陷；因此，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深刻的批判”^⑥，发掘文明时代与社会化分工一同发展的现代性规律。马克思从审视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家对文明世界的批判，到自身对资本主义社会大分工背景下文明“进步”的反思，逐步掌握了现代文明的阶段性生成和持续性推进的发展规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建设展现阶段性飞跃的特征，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形式都是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于中国共产党开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两个结合”的必然产物，先后经历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结合阶段。各阶段塑造的文明形态体现了对当时现代化建设和水平和进度的现实判断与反思，推动人们向未来敞开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的空间。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

④ 吴晓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使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11期。

⑤ [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王吉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0页。

第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经历质量互变、不断延续的历史进程，建立在文明塑造的连贯性与阶段性相互统一的历史辩证法基础之上。在文明塑造过程中，量变指文明发展在数量上的渐进变化，尽管此时产生一定程度的质变，但由于内容变动的程度和范围不明显而难以把握文明变化的性质。文明发展经过量的积累，达到该文明所对应的社会历史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临界点，就会产生飞跃式的变化。各阶段相互衔接、合为一体，折射出文明塑造过程的连贯性与阶段性、渐进性与飞跃性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消灭资本，“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①，明确无产阶级的斗争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同时，预示新的文明类型即将在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对峙中实现量的延展和质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的历史预言”^②。当今时代，中国将“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作为重大历史课题深刻提出，意味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在连贯性的量变过程中逐步奠定了阶段性质变的基础。从中华民族演进的时间轴看，现代文明并非传统文明以线性样式演化而来的结果，而是传统文明以量变积累实现现代化升级的建构过程，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与现代化实践的逐渐结合以及从改革开放促进文明现代化的宏伟进程到新时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中华文明的演变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合表现为文明现代化程度的渐变过程，中华文明在走向现代化的量变中积极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为达到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质变提供可能。与此同时，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启，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身新的量变开辟了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表明：推动中华文明实现现代化的任务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向，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和特定范围展开量变，最终达到人类文明的整体飞跃和发展。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文明变革、创造文明新形态的自主选择和对历史规定性的超越以及在历史辩证法基础上抓住社会环境变化与时代背景转变中产生的机遇，能够积极促进文明形态的质变和进步。

第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形成的必然成果，把握其背后深刻的历史辩证法理论基础，有助于促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规定性得到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对文明塑造连贯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特征的把握，不仅为不同民族的文明创造提供了客观知识和普遍规律，而且蕴含一种与人类文明整体性存在和发展休戚相关的生存论哲学思维，表达了人类进步和自由解放的文明旨趣，是各民族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都必须遵从的基本准则。矛盾观点是历史辩证法的核心观点，批判与革命是历史辩证法的理论本质。人类文明的塑造既要善于在复杂的现代化浪潮中辨识各种矛盾并探索解决路径，又要勇于批判虚假的意识形态并对其革命，以“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承认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客观矛盾，植根于文明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生命特性，通过普遍交往和批判性对话为尊重文明世界的基本规律、寻获整体前进的真理开拓空间。

第五，历史辩证法对其运用主体的人文底蕴和精神境界具有内在的高标准要求。中华民族作为自身文明创造的主体，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能够为文明稳中求进提供关键的价值共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已然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图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从建立起一般关联逐渐深化至本质联系，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为理论表征，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为深层内核。证明只有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使理论逐步与本土化实践建立起本质关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历史地定向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位。中华文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目标表明：中华文明的建构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其定向，是中华民族以共产主义理想文明形态为典范而锚定的阶段性目标，并使其实现融铸于建立真正“自由人联合体”这一连贯性的终极目的。中华民族成为科学运用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在此基础上探索出实现文明复兴的方法论，推动东方文明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不断丰富历史辩证法的真理性内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② 刘同舫：《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唯物史观阐释》，《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12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二、人民主体性与客观历史规律良性互动的认识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具体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的一般规律的总结和对人类文明向共产主义趋近的必然性的判定。

马克思并未对转变的路径和方法给予细节性阐释，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时提出，“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①，主要在历史辩证法的视域中谈论认识的辩证过程。列宁运用唯物主义认识论剖析了俄国的经济结构及其通向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之路的情势，并运用辩证法探索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和方法，将认识论与辩证法相结合，形成“群众实践”与“书本结论”以及“生活公式”与“书本公式”相结合的认识辩证法。列宁在运用这一方法时肯定了人的认识过程的辩证特性，即“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②，揭示了认识从感性走向理性、从抽象走向具体的辩证过程，指明了无产阶级建构社会主义文明的路径选择。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进程中，社会历史演变的客观规律与人们对文明世界运动的能动把握之间存在认识的辩证关系。中国人民依据自身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主体性统领并协调斗争性和自主性，始终坚持“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总体性的认识的一个阶段”^③，在具体的文明实践中推动规律的必然与偶然相统一，进而实现人民主体性与客观历史规律性在新的文明发展阶段的良性互动。

第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与主体性建构形成内在承应关系，在新时代呈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向度，反映人民主体在认识辩证法基础上对客观规律的凝练和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均从关系角度出发探寻人类掌握客观规律的认识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审视“绝对的批判”对认识辩证法的遮蔽，指出鲍威尔认为“‘真

理’和历史一样，是超凡脱俗的、脱离物质群众的主体，所以，它不是面向经验的人，而是面向‘心灵的深处’，为了‘真正被认识’”^④，马克思、恩格斯将“经验的人”作为认识真理的主体。列宁提出“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⑤，充分调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主体力量。人民主体逻辑与客观历史规律的良性互动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辩证法基础。推动中华文明不断走向成熟，日益成为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追求自由解放的时代自觉，在此过程中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文明的关系进行深刻体认，有利于对文明创造的样态、进程和趋势等进行动态性确认和调节；中华文明的形塑在客观上体现为不断建设和深化的过程，其具体内容、结构和制度等不断发展并渐趋复杂，促使主体为更好解决文明资源的配置、获得文明权利等现实问题不断积聚创造性经验并与客观规律相适应。将人民作为主体创造力量，实现人民主体与客观规律在理念和方法层面的互动，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特征和关键优势。

第二，生命科学和数字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繁荣，使现代文明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文明类型，此时在把握文明演进的客观历史规律和复杂态势中有效发挥人民主体性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领会和运用辩证法的理论基础上，将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文明特性提升为具有更高位阶的一般意义，即把中华5000多年文明传统的现代意蕴提高至在人类文明中具有真正历史高度的“普遍性”^⑥，得益于人民主体的特殊实践对各民族能够实现自主性的有力证明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关于一切民族之虚幻普遍性主张的湮灭。“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⑦中华民族在文明塑造中逐渐意识到，与认识辩证法相结合的民族文明特色，既包括人民把握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本土的独特表现，又包含对古老文明在同现代文明融合中孕育的崭新内容与创新形式，进而处理好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地位与应对客观规律及形势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认识规律和创造历史的角度确认人民的主体性已成为当今世界文

①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285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1、126页。

⑤ 《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

⑥ 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

⑦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

明发展的共识，但“如何从机制上真正实现人民的文明主体地位，仍是一个世界性的实践难题”^①，也是具有普遍性的认识难题。人类文明形态的新旧更替程度错综复杂，中华文明在变化中面临诸多发展问题。中国在机制和操作层面始终将文明互鉴与包容精神落到实处，推动人民在认识一般规律的同时把握动态形势，确立自身在现代文明创造中的主体地位。

第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现实的文明构建中展现人民主体与客观历史规律的双向互动，实现了对认识辩证法基础上的中国化时代化转变。马克思主义认识辩证法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过程中充分彰显自身作为“批评的武器”的理论力量，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观依托的资本逻辑和生产方式必须借助“武器的批判”才能得以消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内在于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必然环节，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逻辑及其现实生产方式的影响，但其在自我文明的建设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影响的限度，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中发现中华文明通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明前景，呈现了双向互动的发展维度：在确定人民主体的基本逻辑中发挥其对历史前进的推动作用，即客观历史规律在文明塑造中不是外在于人的实体性力量，而是充当有机的参照物融入人的认识系统；在拓展认识对象的规律中明确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即人不是被本质逻辑规定的存在者，而是跟随文明进步趋势充分占有自身本质并进行自我创造的主体。

第四，在认识辩证法的基础上，中华文明展开了人民主体与客观历史规律良性互动的进程。作为后发的现代文明国家，中华民族对资本主义文明将世界市场视为文明扩张以实现资本增殖的逻辑具有清醒认识，有效汲取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有益成果，明确了建设自身文明的认识对象——高度关注资本逻辑对中华文明发展产生的新影响，广泛发掘中华文明自身的优势资源，“深刻反映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内在联系和上升过程的完整性”^②，维护不同民族主动探索自身文明道路的自主性和话语权。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新民主主义文化目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构建“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文化”方针，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将文化发展置于改革开放总布局予以筹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总结文明演进历史规律中求索适合人民需要的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在文明建设中塑造“高度文明的人”、在人民主体作用下实现文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必然，立足人民主体的文明史观，倡导审视科学规律的总体性视野。

第五，认识辩证法表明，只有以人民为主体才能认识客观历史和文明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觉把握当今时代文明世界内部展开的主客体矛盾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性与客观历史规律良性互动的方法论原则在人类文明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时代范本。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分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文明冲突时指出，“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③。马克思不仅澄清了现代文明与现代工业生产相适应的基本规律，而且突出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作为文明演进驱动力的永恒规律，即发展程度高的文明必将战胜和取代发展程度低的文明。人类对文明程度的认识过程呈现辩证性和长期性特征，文明世界存在于持续建构的动态之中，文明的阶级性冲突在此过程中自然成为转化的直接动力。在人类文明发展逐渐融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促使个体从地域性空间获得解放。但全球范围内生产、交换和分工的扩展，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文明在由资本逻辑主客二分观念的支配下只能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形成“实体性关系”，即人只能将文明当成脱离真实内容的存在。文明进步主要以“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④为呈现方式。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建设中确定了突破认识对象之限度的主体力量，即人民群众认识的无限性能够克服个体认识的局限，人民能够将对象性的文明存在样态转变为辩证的生命存在方式，在自身与文明之间营造一种“功能性关系”，保证人民在运用规律、创造文明的同时自觉从中汲取能量并使其转化为服务

① 陈忠：《世界文明史意蕴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价值》，《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1期。

② 刘同舫：《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解放事业的当代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0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3-614页。

④ [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页。

发展的内在支撑。

三、“两个结合”与“两种作用”有机融合的实践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以围绕人的生存方式展开的辩证规律及其现实运用的问题为聚焦对象，赋予社会历史以实体性内容、赋予人类文明以现实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深刻批判了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神秘色彩，将革命本质落实到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和建构共产主义文明的论题上，证明了辩证法作为方法论范畴与人的生存性实践之间的密切关联。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与构想理想社会形态的阐述中揭示了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指出“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①。恩格斯从现实的扬弃活动中总结出“两种作用”的路径，即“普遍的相互作用”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②，旨在说明主体掌握并运用规律进行创造性实践的方法论。

针对人们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和分工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文明的丰富性取决于现实社会关系的全面性，依靠共产主义革命实现，“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③。这体现了“两种作用”的力量：人类从事的政治、经济和哲学等实践与创造理想文明类型的活动形成“普遍的相互作用”；人们在创造理想文明中揭开文明有机体的内在矛盾并凭借文明自我运动的“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两个结合”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其体现了双重创生性力量：在自身文明演进的矛盾斗争中发挥普遍的相互作用，在与自发资本主义文明霸权的交流交锋中形成对立的相互作用，将中华文明铸成有机生命体。因此，“两个结合”与

“两种作用”的有机融合，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辩证法基础。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两个结合”，在“两个结合”与“两种作用”的有机融合中为中华文明的赓续、创新奠定了实践辩证法基础。“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④中国共产党坚持发挥人民的主体性力量，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和文脉底蕴，阐明道路与文明塑造之间的内生性关系^⑤。新时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表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并非偶然，而是取决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性实践的契合。“两个结合”贯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百年发展历程，在具体的文明构建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主体，人民群众是依靠力量。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为文明建设付诸高质量的实践力量，有赖于人民群众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自觉立足中华民族的文明延续进程，在文明建设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锻造。具言之，“两个结合”与“两种作用”的有机融合体现为三点。

第一，“第一个结合”与“普遍的相互作用”有机融合，为处理好文明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奠定实践辩证法基础。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独特的生存价值和思想自由，文明演进是在人与人之间矛盾作用下呈现的人类历史进化趋势，“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⑥。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文明进步与人们从事的生产实践之间的紧密关联，叙述了文明成果在祛除现有文明桎梏的社会变革中得以产生的客观逻辑。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生存方式，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中重构了人的劳动现代性的意义，主张通过生产劳动走进历史深处以还原现代性的本真面貌。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进程中，文明性依托现代性得到实现和表征，只有

①③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542、97页。

② 恩格斯在探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提出，“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通过经济、政治、法律和哲学等领域永恒发展的观点说明相互作用的普遍性；在论述物质运动的对立统一规律时，恩格斯认为，“这些对立通过自身的不断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页），证明辩证法是关于事物在对立中发生作用和运动的学说。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⑤ 张城：《“两个结合”视域下文明、革命与道路的内生性逻辑》，《开放时代》，2024年第1期。

顺应现代性趋势的实践才有可能创造文明新形态。“文明是最崇高的联系纽带，人类在文明的旗帜下聚集在一起。”^①作为创造主体的人民自身现代性的实现，需要在参与现代化实践中确证个体自觉的生存状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一切现实领域和因素的“普遍的相互作用”。具体而言，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人们能够把握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既明确文明塑造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影响，又对上述领域及其走向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人们能够分辨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关系，在“第一个结合”与“普遍的相互作用”的有机融合中，明辨经济关系与经济建设具有决定性地位，但经济本身不能直接对文明发挥作用，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由实践转变为深刻认识，进而引领人们进入文明深层建设的实践中。

第二，“第二个结合”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有机融合，为处理好文明传承与文明交流的关系巩固实践辩证法基础。文明传承是不同文明交流和共同进步的动力源泉，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使其对世界其他文明秉持包容胸怀。文明包容度的形成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文明发展早期，不同文明之间以混同的方式存在，直至世界历史形成才衍生具体的不同形态。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始终注重处理好彼此发展的关系，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在文明创造实践中注重把握“第二个结合”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的有机融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质是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相结合，形成一种经过中华民族性质赋型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决定了建设中华文明实践的特殊性“是由中国进入到‘世界历史’之中的独特处境来规定的，并且是由此种处境中历史性实践的特定取向来规定的”^②。在由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文明冲突论”一度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肆意扩张的手段，加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博弈思维，也使中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人类文明遭遇的境况以及创建新文明类型的必要性，积极思索促进多元文明和谐对话与共同生存的路径问题。在“第

二个结合”中，中华民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导传统文明与现代化相结合以及与外来文明展开对话，在处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关系中发挥“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实现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并在与外来文明的对立中实现辩证统一，发掘不同文明共同追求的价值因素，促使多样文明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和对峙力量转化为相辅相成的推动力，进而展开平等的文明对话和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恩格斯将生命有机体的辩证生存方式描述为“从自己周围摄取其他有用的物质，把它们同化，而体内其他比较老的部分则分解并且被排泄掉”^③，发掘有机体中蕴含的“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开放包容的生命共同体，既能在曲折探索中促成内在矛盾的积极转化，又能在具体机制与现实行动上优化自身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对立作用，营造追求高质量、追求世界先进水平的文明互鉴生态。

第三，中华文明在建设不仅体现“两个结合”与“两种作用”直接对应式融合的实践辩证法基础，而且包含“两个结合”与“两种作用”的交叉融合。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文明的一般原理，其与中华文明的建设并不总是构成因果关联，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能够成为文明构建的关键动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以中国的现实条件和需要为转移，“既包括空间维度上的，也包括时间维度上的”^④。就空间维度而言，“第一个结合”基本指向与中国实际发展情况相结合，同时涉及与群众基础和主体作用相结合，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关涉对文明的传统与现代、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现代化等问题的思索。在此过程中形成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尽管主体间的差异在文明实践中可能会产生矛盾，但能够通过对话与协调的相互作用得到解决，并形成创造文明的内在动力。就时间维度而言，“第二个结合”致力于实现5000多年文明史的创新，铸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⑤，意味着“第二个结合”在

① [美]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45页。

② 吴晓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哲学研究》，2019年第7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④ 刘建军、邱安琪：《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内在规律的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6期。

⑤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正确处理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关系的同时，还要协调处理整个文明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和作用。

四、结 语

当今时代是世界文明加速发展的时代，是不同文明碰撞、冲突频发和谋求价值共识的时代。作为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现代化表达了对文明共通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时代声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突破了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一元论和线性发展思维，确认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整体演进的历史趋势，在现代化轨道中探索自身民族

特色与全球现代化普遍规律相融合的路径，呈现多元现代性之于人类文明延绵发展过程的时代标识与多样图景，体现了深厚的辩证法基础。中华文明在历史辩证法基础上对现代化与文明建设的内容予以动态把握，在认识辩证法基础上实现人民主体性与运用客观规律的高度统一，在实践辩证法基础上确证“两个结合”和“两种作用”共同推动开启人类新文明类型的实效性和持续性。这充分表明中华文明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激发并挖掘不同文明活力的理论和实践智慧，证明这一辩证法基础同时构成差异性文明对话互鉴的基础，体现了在当今现代化和文明创造中促使人类辩证思维有效融入生存论实践的现实意义。

The Dialectic Foundation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YIN Jian¹ LIU Tong-fang²

(1.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

2.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Abstract: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modernity, the purpose and means of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which has a profound foundation of dialectics. On the basis of the historical dialectics of the coherence of civilization shaping and the mutual unity of stages,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gradually begun to independently choose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ranscend the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epistemic dialectics of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subjectivity and the objective laws of history,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effectively broken through the civilization pattern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and determined the status of the civilization subject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modernization subject with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On the basis of the practical dialectics of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wo combinations" and "two roles",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gradually promoted the confidence of its own civilization and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The dialectic foundation of the modern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come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of effective dialogue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common norms of modernity in the concret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 Dialectics ; Civilized Subjects ; "Two Combinations"

[责任编辑：王文秋]

[责任校对：曹晶晶]